

日本白集版本源流综论

文艳蓉

作为唐代著名文学家,白居易的诗文集历来流传颇广,甚至传播海外。在隔海相望的日本国,所存白集版本即十分丰富,有按先诗后笔编排的宋刊本和明刊本,有按前后续集编排的古抄大集本和宋、明刊本与古抄本的校合本,还有日本国对白集的选抄本和选刊本,以及《新乐府》、《长恨歌》等单行本。笔者收集了日本白集的诸多版本资料,并利用了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①,对日本白集版本源流的状况作出勾勒,力图推进中日两国白居易研究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一、《白氏文集》大集本

日本的古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②,它是保持了白集原始编集面貌的前后续集本,原本由丰原奉重及其雇佣写手唯寂房、融范、康经等人从宽喜三年(1231)至贞永二年(1233)费时三年书写而成,因曾保存在镰仓中期幕府武将金泽实时所创建的文库而得名。目前留存共有三十卷,可以大致区分为两种抄本:一是宽喜三年至建长四年(1252)二十年间丰原奉重校订的镰仓抄本,一是与奉重无关的平安末至镰仓初的写本,称之为别本。奉重校订本有:大东急纪念文库藏卷六、九、十二、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一、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七、五十二、五十四、六十二、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八,天理图书馆藏卷三十三,田中穰氏旧藏卷十四、五十九,保阪润治氏旧藏卷四十以及存否不明之卷四十四、六十一(大垣市立图书馆藏那波本的书入记载)。别本包括田中穰氏旧藏卷八、三十五、四十九,三井高坚氏旧藏卷二十三、三十八。

从本文源流上来看,金泽文库本的直接底本是博士家菅家传本,而菅家本

①如太田次男的《神田本白氏文集の研究》、《旧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花房英树的《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等专著。

②关于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的基本情况,可参见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则是中世流传的惠萼本传写的。金泽文库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保留了这些惠萼本的奥书,现共十一卷有惠萼会昌四年的识语。其中奉重本卷十二、五十二、五十九、别本四十九中各卷识语在本文尾后,尾题之前,可能是本文书写者之笔,因而其祖本是惠萼本的可能性较大。卷三十一、三十三、四十一的识语在本文书写完之后,校订时由奉重之笔转记,与原本无直接关系。此外,金泽文库本有的卷子与宋刊本关系密切,如卷五四奥书云:“此卷书写之本欠之,问寻折本,书入之处,折本又折销,所多之。故或遗料纸,或付置轮,毕以证本重可令比较之也。”^①可知抄本原佚,此卷以折本为底本。折本即宋刊本,太田次男推测为北宋刊本,因为此卷与宋绍兴本比较,有诸多相异处。卷三十一、三十三的底本也是宋刊本的重抄本,但惠萼会昌四年的识语仍被转写下来。可见,金泽本的版本源流十分复杂,谢思炜概括为:“它是一个以唐写本系为主体、部分采纳了北宋刊本的古抄本。”^②金泽本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保留了惠萼本与日本北宋刊本曾经存在的痕迹,而且对《白氏文集》的校勘有独特的价值。

据日本近代学者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又名《汉籍善本考》)所载,他曾于狩谷掖翁那里得一极珍贵之覆宋刊本,旧人载目皆不曾著录,第十九、二十八、三十一各卷末有“应安六年(1373)、永和元年(1375)读过”之记。书中有掖翁载云:“皇国贞和纪元刻”^③,但岛田翰认为此说无据,他推断此书确为应安六年以前的刊本。此本亦为前后续集本,共七十一卷,岛田翰根据字画式样推定其祖本为宋初刻本,并认为它是上承东林寺本的宋真宗时期刻本,也是那波本之祖本。此本虽极其珍贵,但不见载录流传,故而影响有限。之后,与金泽本对日本白集版本影响同样深远的是那波本,它是那波道圆元和四年(1618)以朝鲜本为底本刊刻的活字本,是保持了白集原貌的前后续集完整本。

那波本的面世使当时学者欣喜若狂,他们纷纷利用那波本来与古抄本相校,力求让白集更加完善。其中首当其冲者是林道春,据庆应义塾大学的斯道文库所藏本《林家白氏文集跋》中题有涩江抽斋的《金泽本校正篇目》载:“罗山先生所校,有依金泽本,有依宋刊本。今虽不能悉识别,而春斋先生跋文所谓旧点四十卷者,略可考知。因举卷数之目如右,其载金泽本跋者,以朱圈标之。”^④《经籍访古志》亦载:“按,林祭酒家藏白集,罗山先生就金泽本校过者,校止半部。间载宽喜三年、贞永元年唯寂房寂有,右金吾原泰(当为奉)重等书写校点记,及会昌四年旧跋,冠‘菅本云’、‘本云’等字,即知金泽本系宽喜、贞永间依

①[日]川濑一马监修:《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影印)第4册,勉诚社,1981年,第47页。

②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第46页。

③[日]岛田翰:《汉籍善本考》卷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75页。

④[日]太田次男:《旧钞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上册,勉诚社,1997年,第195页引。

菅氏本重抄,而会昌跋文亦从菅本传录也。”^①由此可知,林罗山本以那波本为底本,以金泽本、宋刊本为校本,并将金泽文库原来的奥书移写入本书。此本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但林道春只校点四十卷,剩下之卷是由其子鹅峰于宽文十二年(1672)至延宝元年(1673)冬点完,称为林读耕斋校本。林罗山本多用力于训点和句读,而读耕斋本更关注与金泽本为中心的诸本对校。

林罗山校本对后来的校本影响较大。阳明文库藏校本、书陵部藏校本和蓬左文库藏校本都在其基础上对白集进行校勘。其中阳明本使用了林罗山未见的旧抄本对校。书陵部本卷四有奥书“宽永元季冬,西山期远子贞子元志”,可知它继承了贞子元本,又吸收了林罗山本和阳明本成果,校语比二本更为详细。蓬左文库本成于宽永六年(1629),有识语云:“元和九年夏五月望日写点焉,期远子。宽永六年季夏廿六日写之。洛阳默室主人。”可见其亦继承了贞子元校本,并且在综合以上诸本对校之外,还利用了金泽本以外的旧抄本来校正。如卷十一云:“古本云:大唐吴郡苏州南禅院日本国头裹僧惠尊自写文集,时会昌四年三月十四日,日本承和十一年也。”^②此“古本”即为金泽本以外之本。卷六五诗题的校正也用了其他的旧抄本,可能是尊经阁藏天海校本所据之本。因此,蓬左文库本代表了当时最广泛的校勘成果。此外,还有金子彦二郎博士藏校本和和学讲谈所校本,前者为神护寺旧藏本,书写年代和校者不明,属于阳明本系列,与书陵本成书时间差不多,校勘的程度亦与之匹敌。后者据识语成书为宽永八年,利用的校本有林罗山本、金泽本、菅见抄本等,校语不如书陵部详细。以上校本成书时间相对集中,基本上是在林罗山校本成立后至林读耕斋本成立前,足以窥见当时校对《白氏文集》的盛况。

校本当中最重要的还有天海校本,即慈眼大师天海僧正校尊经阁文库藏本。天海校本利用梶原性全本与那波本校对,其珍贵之处在于祖本是比金泽文库本更早的本子。其卷二五下有识语云:“元亨四年(1188)仲春一日以藤宗重之本朱墨共了”,又有“保安二年(1121)春二月二日,于待贤里亭以平祐俊之本移点讫。藤宗重。”性全本曾以藤宗重本为校点本,而藤宗重所据之本为平祐俊(承保二年(1075)在世)本,从卷一三中惠尊会昌四年的识语可断定平祐俊本也是惠尊苏州南禅院本的重抄本。卷六十又有识语:“大治四年(1129)六月上旬以式部大辅敦光之本,息男文章生邦光点全了。”卷六三有识语:“大治四年十一月一日以李部大卿本,息男进士邦光所点之。”^③“式部大辅敦光之本”、“李部大卿本”都是当时的博士家证本,则藤原宗重(?-1131)又采用了博士家证本。可见天海校本所据之祖本比金泽本成书的宽喜三年要早百余年,是保

①[日]澁江全善、[日]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六,《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73页。

②[日]花房英树:《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朋友书店,1974年,第224、226、227页引。

③[日]花房英树:《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第232、233页引。

存了旧抄本面目的重要资料,可惜大部分已残缺。

此类校本之后还有文政六年(1823)刊行的官版《白氏文集》,此本现藏于内阁文库、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等地。据神鹰德治考证,本文是以那波本为底本,参以金泽本、菅见抄等旧抄本及其校注来校异。如卷三十一中那波本所无的九篇作品,即以金泽本为订补。与林罗山校本、蓬左校本一样,使用了旧抄本中的校注。但此本有不少明显的误刻之处,并非善本。^①

近世以来,日本收藏了不少明刊本,如明正德八年(1513)锡山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刊本,有大仓文化财团藏本和鹤见大学图书馆藏本;嘉靖十七年(1538)吴郡伍氏龙池草堂刊本,有多个藏本^②;明正德十二年郭勋编的《白乐天诗集》,藏于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正德十四年郭勋所编的《白乐天文集》三十五卷《年谱》一卷,藏于宫城县立图书馆。此外,明万历三十四年,马元调校本《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刊定,后流传至日本。仅五十年后,后西天皇明历三年(1657),京师出云寺林和泉掾松柏堂刊印马元调本,由日人立野春节句读,称为明历本。立野春节跋云:“虽有菅江之旧点,世以不易获也,时书林闻予偶得菅家点本而强求焉。予嘉其扩世与众,俱而许之。”^③知立野春节以菅家本移点覆刻。后来此本多次重印,主要有后西天皇万治元年(1658)本、宽文二年(1662)京都出云寺本、孝明天皇嘉永元年(1848)本等。

二、单行本

白诗当中,在日本最受瞩目的是《新乐府》、《秦中吟》、《长恨歌》和《琵琶行》,如十四世纪三条西实隆自笔本,就只收这四组诗歌。它们体现了日本对白诗的独特受容,因此,需特别予以论述。在谈及版本时,不只涉及其单行本,也论及大集或选抄本中所收之本。而这些诗歌的单行本有的成书时间很早,流传广泛,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校勘价值也很高,需要格外加以关注。

1.《新乐府》与《秦中吟》

《新乐府》是日本白集中版本留存最多,源流也最为复杂的组诗。大集刊本中的且不论,就是单卷(卷三卷四)留存的古抄本,据《神田本白氏文集研究·校勘记》中所列,就有近三十种之多。有的存卷三,如时贤本、猿投本、真福寺本;有的存卷四,如顺德天皇建保四年(1216)本、四条天皇嘉祯四年(1238)本;有的卷三卷四皆存,如神田本、飞鸟进雅本、醍醐三宝院藏镰仓本。这些本子保留着“白氏文集卷三”、“白氏文集卷四”的题头,很明显是从大集中抄出而留传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神田本、时贤本、永仁本和正应本。

神田本即堀河天皇嘉承二年(1107)写本,为藤原茂明所书。今存卷三、卷

①[日]神鹰德治:《官版白氏文集》,《白居易研究讲座》第6卷,第280页。

②详见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1479页。

③[日]汤浅吉美:《明曆刊本—馬元調本との校異》,《白居易研究讲座》第6卷,第243页。

四,有奥书云:“天永四年三月廿八日点了。藤原茂明。”^①它是现存最早的《新乐府》古抄本。太田次男原认为神田本的祖本为唐抄单行本,后来对此观点作了修正,指出它应选抄自大集中,因其卷次明记为卷三、卷四,藤原茂明又在卷三的奥书中说明它是白诗的入门书^②。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保持了唐抄本《白氏文集》本文实态的珍贵资料,这一点可以从它与唐抄本敦煌本《新乐府》中的本文相似处看出。神田本的版本源流和金泽本一样复杂,既有唐抄本和日本旧抄本的本文系统,又有与宋刊本相近的本文。太田次男在比较了神田本与诸本之间的关系后,认为宋刊本与神田本的一致可以说明宋刊本本身的优越性,这一点对于日本学界长期以来盲目重视日本古抄本而忽视中国的宋刊本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时贤本即后醍醐天皇元亨四年(1324)写本,今存卷三,可能取自白氏原本传抄,卷中白氏自注极多,宋本以下皆不见。卷尾有识语曰:“元亨四年十月一日以菅家证本书写讫。侍从时贤。”“以式部大辅正家朝臣侍读本见合了,彼点以朱写之,校了。”^③可见,它是以日本古抄本菅家本为底本,同藤原正家本进行校对的。有的校语来自宋刊本,应是时贤本所据旧抄本本身就有宋本系统中的文字。

天理图书馆藏伏见天皇正应二年(1288)写本,今存卷四,卷尾有手识文云:“正应二年己丑七月十六日书写了。严竑傳。”^④首题“文集卷四 太原白居易”,次行低一格题“新乐府 讽谕四 杂言凡三十首”,这种题式与其他宋刊本相异,那波本、绍兴本“讽谕四”在“新乐府”之上。“杂言”二字宋刊本以下诸本无,当是脱落,日本学者推测这可能是白居易集本的原态。在文本源流上,它继承了平安末抄本。

永仁元年(1293)抄本,今存卷三,奥书为:“永仁元年八月十七日于镰仓金剛寿福寺书了。朝誉。六十五。”^⑤卷首题为:“文集卷第三 太原白居易”,绍兴本无“太原白居易”五字。神田本与此本同,清少纳言《枕草子》卷九中“书是《文集》、《文选》”^⑥也与这个标题相呼应,这有可能是白氏撰集的本来面目。序和本文与绍兴本、那波本都有不同,而多与神田本相似。可见,此本亦继承了平安抄本。

除了抄本以外,日本也有一些对《新乐府》进行注释的书,有的是以汉文

①(神田本)《文集卷第四》影印本,古典保存会,1929年,卷末。

②原观点见于太田次男《神田本白氏文集の研究》,第174页,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曾转录,第40页。修正后观点,见《旧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上册,第616页。

③[日]太田次男:《旧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上册,第698页引。

④《文选·赵志集·白氏文集》,天理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73页。

⑤《文选·赵志集·白氏文集》,第420页。

⑥[日]清少纳言著、周作人译:《枕草子》,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301页。

注释,有的以和语谚解。汉文注释书有真福寺藏宽喜三年写本《新乐府略意(第七)》和醍醐寺藏室町初期写本《白氏新乐府略意》二卷,撰者皆为山阶寺僧信救。真福寺本为残本,原分上下卷,上卷分三卷,下卷分四卷,此存第七卷,为白集卷四《草茫茫》至卷末七首,皆加注。醍醐寺本《新乐府》五十首全部加注,其奥书云:“宽喜二年闰正月二日,于醍醐寺地藏院书写了。此书先年之比参箠信贵山之时,撰者信救(本名信阿)适持来之,卒余之间才上卷许誂人书留了。其后已经数年,而今不虑之外感得他本,仍所书加也。俗书虽有斩泥之诚,乐天之志已达深理,大圣诚言也。且为后叶书了而已。同年三日点了。深贤记之。”^①可知此本为深贤抄写加点。二本中真福寺本比醍醐寺本的注释要更加详细些,注文中所引书名涉及《史记》、《文选》、《左传》、《毛诗》、《书》、《管子》、《五行大义》、《五连图》、《法苑珠林》等十馀种经、史、子、集类汉籍。至于其《新乐府》的本文使用的底本,可能是与神田本相近的《白氏文集》。

和语注释书有《白氏长庆集谚解》,虽称全集之名,但实际上只是卷三、四的《新乐府》的注释。本书著者、时代不明,据解说者^②从纸质、笔迹、书志等推测,大体是宽文、延定年间至贞享年间。本文与古抄本不一致,而与近世刊本多一致。解说者以元和四年刊那波本、明历本与之相校,发现它和明历本相近,当成于明历本之后。从字汇的使用来说,它引用了宽文十二年(1672)所出的《增注改正头书字汇》,也可证此书当成于宽文十二年以后。

日本《新乐府》单行本主要有镰仓末期伏见天皇临摹小野道风书迹《新乐府》二轴(被称为“御物本”)和后光明天皇庆安三年(1650)片山舍正刊印《新乐府》一卷。御物本原分两卷,外题“新乐府上(下)”,内题卷首为“新乐府”,太田次男将其本文与《新乐府》诸本进行比较,发现它与敦煌本相近处最多,其次是《白氏讽谏》本,可见其与中国单行诸本关系密切,其祖本可能是唐抄单行本^③。庆安本为奥田松庵手抄本的摹刻,卷末奥书云“以菅家相传之秘本写之毕”^④,有卷子本、折帖、册子本等多种形态保存本。与御物本一样,它没有标明卷三卷四,且省略双行小注,但有首序,其本文介于抄本与刊本中间,与后者更近些,祖本可能是最接近旧抄本的宋刊本。

《秦中吟》现存单行本主要有仁和寺藏延庆二年(1309)书写本一轴和宫内厅书陵部藏三条西实隆自笔本一轴。仁和寺本有识语云:“延庆二年五月十一日,以极秘本书写了。阿闍梨祐惠。本奥云:文治四年(1188)三月十九日,侍禅定大王御读于大寺院御所北窗奉授了。散位从四位上藤原敦经。又云:健保

①[日]太田次男:《旧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下册,第13页引。

②[日]森孝太郎、尾崎知光:《白氏长庆集谚解》,和泉书院,1986年。

③[日]太田次男:《旧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中册,第629页。

④[日]太田次男:《旧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中册,第619页引。

元年(1213)九月十四日,召大内记长贞读之了。往年虽受传敦经说更点,少少依有相违重,今寻伺菅说也”^①,可知它原是博士家藤原家藏本,所加训点亦是菅家训。古抄本还有酒井宇吉氏藏《白氏文集》卷二院政初期本,又称后二条本。选抄本有《文集抄》和《菅见抄》所收之本。太田次男将以上五本与那波本、宋刊本等诸本校勘,发现旧抄本如后二条本、仁和寺本、文集抄本、菅见抄本多一致,三条西本多和宋刊本、那波本一致。可以确定三条西本是以刊本为底本的,而其他抄本在本文上也存在差异,菅见抄本可能用宋折本校合过。《秦中吟》本文最重要的问题是诗题的差异,《才调集》与宋刊本的诗题不同,而以上日本旧抄本原本都没有诗题。菅见抄本虽有题目,但是用小字写在上栏,当是用折本校合时增入,而且,平安、镰仓时代的国书、汉籍金句集中所引用的《秦中吟》也不曾有诗题。太田次男据此怀疑《秦中吟十首》唐本本无题,而是宋本在刻时为方便起见而加的。如果这种观点得到证实,这对于《秦中吟》的研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2.《长恨歌》与《琵琶行》

除了《新乐府》以外,《长恨歌》和《琵琶行》是白诗中在古代日本流行最广的了,尤其是《长恨歌》,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影响尤为深远。两诗在中国没有发现单行本,但在日本却有不少单行本,有二诗同体,也有两诗各自独立单行。

日本《长恨歌》单行本是从大集中抽出来的。最早的本子是后伏见天皇正安二年(1299)写本。此本被称为正宗敦夫本,书者未详,奥书云:“正安二年五月二日以中院三位有房卿本书写之毕”、“本云:文永五年二月廿一日以菅宗本书写之毕。在判。”^②可见,其亲本是有房卿本,有房卿本以菅宗本为底本,而菅家本又以僧惠尊会昌四年书写的六十七卷本为底本,足见其文献价值。从与其他本子的比较情况来看,它与古抄本相近,而多与刊本相违。古抄本中,又与金泽本关系疏远,而与正安二年七月写本更近。解说者认为:“正宗敦夫本应是从菅家本《白氏文集》中提取出《歌》和《传》的比较忠实的再转写本。”^③从训点来看,正宗敦夫本主要是以菅原家的训说为基础,并采取了大江家等其他异说。

正安二年七月写本即三条西家旧藏本,其奥书云:“于时正安二年七月廿四日于新熊野泷尻房书写毕。执笔寻亲。源命德丸之。”^④它仅比正宗敦夫本晚两个月写成,与正宗敦夫属于同一系统,将《歌》、《序》、《传》合载,独立一卷

①[日]太田次男:《旧抄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中册,第476页引。

②《正宗敦夫文库本长恨歌》(影印本)卷末,株式会社福武书店,1981年。

③《正宗敦夫文库本长恨歌》,第19页。

④《正宗敦夫文库本长恨歌》,第26页引。

相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本皆收有在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序》^①,从奥书来看,此《序》在文永五年(1264)之前形成,以《序》置于《传》、《歌》之间的形式在此之前即已流传。其他《长恨歌》单行本文和元年(1352)写本、斯道文库藏室町期写本和阳明文库藏江户初期墨迹二卷本却都无《序》,尽管从本文上考察,它们与正安写本十分相近。可见,当时无《序》本与有《序》本是并行的。

日本十六世纪以来出现了很多《长恨歌》与《琵琶行》的注释本,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是清原宣贤自笔本《长恨歌琵琶行》。此本现藏于京都大学图书资料室,识语为:“天文十二年(1543)八月十五日十六日,于万里小路亭讲之长恨歌琵琶行。环翠轩宗尤。”^②卷首有和语之序,正文列一句诗,下面是和语翻译和解读。受《长恨歌琵琶行抄》注释影响的抄本有很多种,如天理图书馆藏分阳仲恩笔《长恨歌琵琶引》室町期写本、内阁文库藏《长恨歌琵琶行和解》天正五年(1577)写本等。国田百合子还对八个版本的《长恨歌琵琶行抄》进行了翻字和校异^③,这八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宣贤自笔本的影响,属于宣贤本系统。受宣贤系统注释影响而成书的还有浅井了意的《やうきひ物語》。本书为万治宽文(1658-1672)年间刊行,但改变了宣贤的注释,而为《长恨歌》的平假名抄,并参考了其他资料。另外还有贞享元年(1684)小佐治半左卫门、同半右卫门刊行的《歌行诗谚解》,收录有《长恨歌》,它亦为宣贤的复写本,上段注解,下段本文,本文附训点。训点以宣贤本为参考,注解引用宣贤抄文,同时有“愚按”之语,为著者的见解。

《长恨歌》在流传过程中与绘画艺术相结合,产生了图抄本。如ライデン民族博物馆藏的奈良绘本,它是继承了室町时代平易的汉文注后加入插画而成,中野幸一氏所藏等五个绘卷本属于此系统。筑波大学藏《やうきひ物語》也有插画,属于其系统的有东洋大学藏《ちやうごんか》奈良绘本和大谷女子大学藏《长恨歌绘卷》等多本^④。另有狩野山雪笔《长恨歌绘卷》二卷,对《长恨歌》诗句逐一绘图,忠实于原典,本书现存有模写本久鬼家本。狩野山雪之子永纳于延宝五年(1677)刊行之本有大英图书馆所藏的《长恨歌图抄》及内阁文

①序文可参见胡可先、文艳蓉《论〈长恨歌〉的序与传》(《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5期,第91页)转引松本隆信《中世国语资料》所录,《正宗敦夫文库本长恨歌》与此本文字略有不同。

②[日]近藤春雄:《长恨歌琵琶行研究》,株式会社明治书院,1981年,第129页。

③此八本为大东急記念文库藏庆长版《长恨歌抄》、宽永版《长恨歌》、旧洒竹文库藏《长恨歌》和国田百合子藏《长恨歌抄》等四个古活字片假名抄,中田祝夫博士藏古版《长恨歌》,内阁文库藏《长恨歌抄》、国田百合子藏《长恨歌新抄》等两个平假名抄,以及ライデン民族博物馆藏的《长恨歌》外国资料一本,见国田百合子:《长恨歌·琵琶行抄诸本の国語学的研究翻字校異篇》,櫻楓社,1983年,第1页。

④详见安野博之:《江戸時代にすける〈长恨歌〉享受の一餉》,《白居易研究年报》2003年,第144页。

库藏《长恨歌抄》，两书内容完全相同，内阁文库本先刊行，注释简略，卷末有跋文。元禄二年（1689）刊行的《长恨歌新抄》，所据为宣贤本和《歌行诗谚解》，但也用了其他新材料进行订补，并受到《图抄》的影响，插入画图。

在以上各种抄本与刊本中，有《序》与无《序》依然是并行的状态。清原宣贤自笔本和三条西实隆自笔本、庆长刊古活字本、宽永四年刊本、《歌行诗谚解》等有序，和刊本庆长勅版《白氏五妃曲》无序；东大国语研究室藏天文二年写本、茨城县六地藏寺藏近世初写本、松花堂昭乘墨迹庆长十九年写本又皆有序。中国并没有出现过此序，它在流传过程中渐渐有人认为是白居易的原序，如外记入道雪庵讲、日重注的《长恨歌琵琶行闻书》（阳明文库藏）云：“此序，乐天自序也。”《歌行诗谚解》云：“此序，乐天之自序也。”^①后者视此为乐天自序影响深远，此后人们一直相信此序为乐天自序。

《琵琶行》又称《琵琶引》，除了大集中所含之篇以外，主要是与《长恨歌》等其他篇章合抄之本，如上面所提到的一些本子，以及小林真赞雄氏藏室町写本、长泽规矩也氏藏室町末近世初写本、阳明文库藏《长恨歌琵琶行》近世初写本等。单行本中重要版本有小林真赞雄氏藏贞和五年（1349）传尊圆亲王写本、斯道文库藏松崎慊堂天保十年（1839）传世尊寺行能笔影写古抄本^②、国立公文书馆藏尊圆亲王小野道风法帖《琵琶引》江户初期模刻本。神鹰德治以法帖与菅见抄本、金泽本、宋刊本、那波本等校勘发现，法帖与金泽本、菅见抄本等旧抄本文本相近，有少量本文是道风法帖的误写或误刻，但也有部分本文与诸本相异，这些特异处多与清原宣贤本和《歌行诗谚解》本相同。他判断法帖直接底本很可能来源于大集之外民间流布的别个单篇《琵琶引》，并推测是在平安时代，遣唐使带回了单行唐抄本《琵琶行》，当时的书法家小野道风，照此书写，真迹在江户时代流传，后被木户常阳收入法帖中^③。这种看法只是其一家之言。

三、白集选本

白集选本是指日人从大集中选录出来部分白诗的抄本或刊本。古选抄本主要有《要文抄》、《菅见抄》、《文集抄》等，它们都反映了镰仓时代对白集的受容情况。近世的选刊本有《白少傅诗抄》、《五妃曲》等等。白集选本多选白诗，或以题材选诗，或以体裁归类，或因便蒙学而编，或因热爱其诗而选，皆体现了白集在日本不同时期的受容状况，有的古抄本还有着非同寻常的校勘价值。

古选抄本中最重要的是镰仓时代的《白氏文集要文抄》和《重抄菅见抄白

①[日]近藤春雄：《长恨歌与琵琶行研究》，株式会社明治书院，1981年，第112页。

②以上版本见于桂诚一郎、隼雪艳：《琵琶引の本文とその校異》（《白居易研究讲座》第六卷，第66页），具体情况不明。

③[日]神鹰德治：《墨迹资料》，《白居易研究讲座》第6卷，第39页。

氏文集》写本。《要文抄》由日本僧宗寺抄写,现分藏于东大寺图书馆和正仓院圣语藏。东大寺藏建长元年(1249)至四年宗性自写本,抄出白集卷一至卷二十中 255 首诗歌。正仓院圣语藏藏文永十一年(1274)宗性写本残卷五十一,自《有感二首》中“来狂歌酒一杯”后皆藏于东大寺图书馆,此本共抄录白集卷五十一至六十的诗文,中间略有残缺。据太田次男考证,《白氏文集要文抄》与金泽文库本有相当程度的吻合,亦抄录于前后续集本,是保持了白集原貌的选抄本之一。《重抄菅见抄白氏文集》写本藏于内阁文库,共十册,第三册已佚。第九册末识语云:“永仁三年六月十七日未刻,于关东田中坊驰笔了,于此日十卷皆终篇功者也。墨点者无本,仍不加之也,以他本更可写之耳。”^①则重抄时间为永仁三年(1295)。此本抄录白集作品的三分之一,卷四十五至卷五十策、判类全部抄入,可知其选抄标准以政治实务类的作品为主^②。太田次男认为,此本末册虽抄有北宋刊本的部分篇目,但大部分与金泽文库本接近,属前后续集本。以上二本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平冈武夫、今井清校定《白氏文集》时,曾把它们作为参校本。

镰仓时代白集流行十分广泛,其中选抄白集之风尤为盛行。现存即有三种《文集抄》,一为国会图书馆藏本,抄录白集卷一、二、五中诗歌 63 首。卷末奥书云:“建长第二之天仲冬中旬之候,于醍醐寺观心院西面部屋折松烟染燕弗毕。桑门极非人阿忍。同年十二月廿五日午终以円莲房本付注毕。”^③太田次男将此本与诸本本文校勘对比后,认为它是平安时代传来的白集唐抄本的重抄本。二为斯道文库藏《重抄文集抄上》抄本,抄录卷一、二、五 41 首诗歌。此书识语与国会图书馆所藏本识语颇同,二者关系应比较密切,但所抄之诗却不完全相同。三为金刚寺藏《文集抄》,外题《文集抄》,内题、尾题皆为《文集抄上上》,全册皆施详密训点,奥书云:“以证本校合了。建治元年五月九日,于小坂亭书之。桑门愿海在判。建治二年九月日,于白川之遍写了。”^④抄赋 2 首,“杂诗” 49 首,是日本古代选抄本中唯一一个抄录赋的本子。

江户时代以来,关于白居易诗的选集刊本日渐增多。这和印刷技术的发展有关,也和白居易的诗歌进一步流行有关。选集刊本大致分为三类,一为按内容收选,二为按诗体编排,三为按诗人编年选录。按内容分类而选刊的较古之本有后阳成天皇庆长八年(1603)敕选《五妃曲》^⑤活字刊印本,收集《白氏文集》中《上阳白发人》、《陵园妾》、《李夫人》、《王昭君二首》、《昭君怨》和

①[日]太田次男:《旧钞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中册,第 126 页。

②具体情况可以参看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第 47 页。

③[日]太田次男:《旧钞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中册,第 212 页引。

④[日]后藤昭雄:《金刚寺藏〈文集抄〉》,《白居易研究年报》创刊号,勉诚社,2000 年,第 78 页。此文后被译成中文收录在后藤昭雄《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中,中华书局,2006 年,第 67-74 页。

⑤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误为《王妃曲》(第 1478 页)。

《长恨歌》等七首描写宫妃的作品。《庆长日件录》中“庆长八年正月二一日”条载：“朝微雪，晴。已刻参内，《白氏文集》之中，《上阳人》、《陵园妾》、《李夫人》、《王昭君》诗四五首、《长恨歌传》等，《五妃曲》卜名被撰拔，以一字版百部被新折，细工众二予申渡者也。”^①详细记录了《五妃曲》的编撰时间和过程。此版底本为朝鲜本，反映了十七世纪日本对白居易作品的受容情况。此外，按内容而分的，还有东山天皇元禄十一年（1698）千种市兵卫、中村五兵卫刊印明释株编《长庆集警悟选》一卷。

选刊本中较多的是分体诗选抄本，主要有灵元天皇宽文十一年（1671）安井治右卫门刊印《新刻拔粹分类白氏七言八句》一卷、《新刻白氏长庆集绝句七言诗》一卷、《新刻拔粹分类白氏绝句五言》一卷等。以上分体诗选抄多以律诗绝句为主，大概是近体诗有着既定的规则，更适于普及和模仿。而十八世纪末期所选刊之诗体则开始变得丰富，如光格天皇宽政九年（1797）须原屋伊八等刊印日人源世昭所编《白诗选》八卷^②，选诗三百首，其底本与《全唐诗》相近，所选诗体分别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七排、五绝、七绝，基本囊括了白诗中的所有诗体。此后不久，还出现了将诗体与诗歌内容结合起来编排的选刊本《新选白诗集》二卷，它是文化十四年（1817）穴户方鼎所选，由神谷重绳、加藤秉彝校对，三河刈谷穴户氏米华堂刊行的。卷一上为五绝、七绝，以春夏秋冬分类，卷二上下册为七言杂部。此本后为汲古书院《和刻本汉诗集成·唐诗十》所收。

编年选本要求对白居易诗歌的解读达到相当的熟悉程度，并需要考证清楚各诗的创作时间，是选本中编写最为困难的，因而此类选本相对较少。日人相马肇《白香山诗抄》就是其中的重要选本。它一共四卷，孝明天皇嘉永六年（1853）由立诚堂刊印，是相马肇以《唐宋诗醇》中白集为底本删定而成，题为《唐宋六家诗定本》。文中有小引云：“此集乃删定《唐宋诗醇》也。《诗醇》所删而收之者，间亦不少所见有异同也。初予课蒙学，读《唐宋诗醇》，又忧其卷帙博大，难遽卒业也。就中拔其醇之又醇兼及其所漏，此集之所以作也。《诗醇》评诸公诗极称允当。今皆取之，所以同于《诗醇》也。浦二田曰：‘读杜者编年为上。古今分体次之，分门为类，乃最劣。’今次诸公诗而逐年谱之，所以异于《诗醇》也。六家中杜诗最难乎解，古今注家千百不少。浦氏独获其心，隐括其文取而附之，亦所以便蒙学也。顷日，相与计刻之家塾，命曰：六家诗定本。所以省笔墨之劳也。”^③将其版本源流和编纂目的说得很清楚。此本共选诗 238 题，

①[日]安野博之：《庆长敕版〈长恨歌琵琶行〉〈白氏五妃曲〉の刊行について》，《汲古书院·汲古》1999年第12期，第31页引。

②据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载，此本还有仁孝天皇天保四年（1834）京都须磨勘兵卫重印本；京都出云寺重印本等。

③[日]相马肇：《白诗抄定本》卷首，孝明天皇嘉永六年（1853）立诚堂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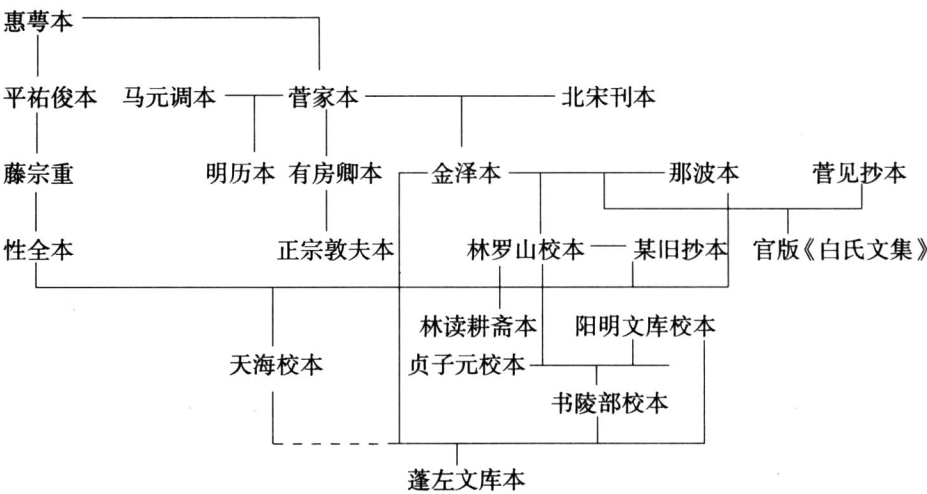
256 首。作品编年为卷一贞元三年至元和四年,卷二元和五年至十二年,卷三元和十三年至宝历元年,卷四大和元年至会昌元年。

综上所述,日本白集的版本种类繁多,源流复杂,其中不乏有许多校勘价值很高的写本和刊本。日本国内对白集版本的研究十分深入,他们利用各种版本对白集进行校勘,出现了一系列成果,如平冈武夫、今井清所校的《白氏文集》与太田次男校异的《神田本白氏文集》,但目前刊印出来仅限于金泽文库本的二十余卷。我国学者谢思炜利用中、日版本资料成功校对完白居易的诗歌,出版了《白居易诗集校注》,目前正致力于校勘白居易之文。我们期待他能尽可能完全地利用日本复杂的白集版本,并预祝其成果早日面世。

本文部分资料由本师胡可先先生提供,成文后承蒙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神鹰德治先生、九州大学大学院陈翀博士批评指正,特此致谢!

附录:

日本白集主要版本系统图



作者工作单位: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